

第二章

寻求内向型增长

Rod Tyers*

引言

在中国以外存在一个广泛的共识，即认为中国的增长将会，而且应当更多地以不断上升的家庭消费而非出口来支撑^①，此共识近年来得到了中国国内的认同。虽然国外的看法是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为其改善对外贸易条件，以更低的成本进行投资，融资和政府支出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这种看法背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似乎是对不断下滑的总体经济绩效的担忧，至少与中国相比有相对高的失业和显而易见的制造业“外包”状况。^②

然而中国增长给全球带来的利益是脆弱的，而且创造了这些利益的中国体制面临着潜在的、引起不稳定的内部和外部威胁。基于这一原因，隐约出

* 本章所做研究由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探索项目资助，编号：DP0557885。该研究的一部分是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访问期间完成的。特别感谢北京大学的卢锋和黄玲在该课题上的建设性讨论，以及 Peter Dixon、Yew-Kwang NG、James Giesecke、李远芳、余森杰、卜永祥和其他 CCER 和 CoPS 学术研讨会的参与者。最近，最新一版稿子得到了宋立刚、Huw McKay 和 Warwick McKibbin 的宝贵评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 Pingkun Hsu、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刘流以及西澳大利亚大学商学院的张颖和 Tsun Se Cheong 担任了研究助理。

① 国外观点，特别是美国的观点，参见 Bergsten 等（2008）和 Lardy（2006，2012）。再平衡包括外部账户在内的中国经济的中国官方路线，参见 Wen（2007，2011）和 Yi（2011）。

② 国外针对中国经济政策体制的敌意被过去十年间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和西方存在的一些看法进一步激怒了。这些想法中的一些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否定了基本人权，还有一些认为中国庞大的政府和国防力量代表着一种战略威胁。参见 Tyers（即将发表）。

现了广泛出现于其他发展中地区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2010）。像国外针对持续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的政治敌意一样，贸易伙伴经济体的糟糕表现明显地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压力。在内部，存在一个不断收紧的劳动力市场，预示着以出口导向为标志的增长自然终结的刘易斯转折点。^①此外，有理由认为增加了的公共投资和培育增加了的私人消费在当前有巨大的政治价值。中国制造业扩张的高环境成本还没有被完全考虑到，同时还有与存在于国有部门的垄断租金相关的、扩大了的收入不平等，而这些问题将存在政治上的困难。^②这一不平等与中国外围的社会经济分层是同步发生的，该分层已经导致了增加了的阶级、民族和地区冲突。

已经有力地摆脱了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所存在的中等收入“减速”是不不断引起更多兴趣的主题（Easterly, 2001; Eichengreen et al., 2011），焦点是存在于自然减速和过早停滞之间的差别。由于递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回报以及减弱了的“赶超”投资激励（Lucas, 2000），穷国在接近全面工业化的收敛过程中会出现自然减速。而强大的反对最后赶超阶段所必需的经济政策改革的既得利益的存在则会导致过早停滞（Haber et al., 2008; Riedel, 2011）。^③减速被视作“陷阱”的那种观念源于集体利益和领导集团利益的分歧，后者与抽租行为（腐败）相关。抽租行为（腐败）会在真实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中等程度时达到巅峰。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阻碍中国未来增长的垄断租和既得利益存在于何处？“内转”会加剧与减速相关联的风险吗？金融部门是垄断租和既得利益的所在地之一。非常高的储蓄给金融部门在不同的投资机会上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提出了挑战。这一过程中的许多薄弱环节部分源于对国有金融机构的保护，已经引起了相当程度的注意（Riedel, 2007; Walter and Howie, 2011）。

-
- ①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时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正如存在于 Cai (2010)、Garnaut (2010) and Meng (2011) 所表达观点中的对立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只是从众多文献中选取的一些。然而，很少有人怀疑转折已经在进行之中，即使对于最近的真实工资上涨是否表明转折点的出现也少有共识。
- ② 对制度改革和产业改革日程以及其困难的讨论，可参见 Deer 和 Song (2012)、Riedel (2011)、Tyers 和 Lu (2008)。
- ③ 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是政治经济学领域已建立的一些文献。这些文献起源于 Mancur Olson (1965) 和 Gordon Tulloch (1967) 以及提出“欧洲硬化症”一词的文献。“欧洲硬化症”用于描述由于欧洲的利益集团冲突和寻租所导致的停滞。

然而从减少受保护经济部门垄断租金的进一步产业改革中可能得到的潜在收益超出了金融部门本身，包括了相对受到保护的国有重工业和服务业。由于政治敏锐性，产业改革较少渗透到这些部门。如果这些改革是内向型增长所要求的，那么实现这种增长在政治上就会是困难的。然而，这种改革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效的替代，这种替代的增长方式同时有助于变革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结构。

还有许多其他实现内向型增长的方式，包括十分重要的支持国内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和制度发展。这些是稳态增长的引擎。在本章我们关注那些在后出口导向时代能够进一步转变中国经济结构的替代性选择。这些选择包括扩大的政府和进一步的产业改革，这其中有纯粹的私有化、国有企业（SOEs）分割、价格帽管制以及重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使用中国经济的一个数学模型，本章对这些转型的经济影响进行了评估。该模型捕捉到了国有寡头垄断企业的行为和下一步产业改革的影响。结果显示内向驱动型增长的最大潜能，正如所预期的那样，存在于重工业和服务业的进一步改革。模拟结果表明进一步增长的最好前景是使用更紧的价格帽管制以打击垄断租和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其中第一点会遭到当前享有垄断租的那些人的抵制，而第二点则抑制了中国政府保护服务业免受外资影响的愿望。

第二节评论出口导向型增长的相对优点，指出中国选择转向内向型增长的原因和讨论内在产生的变革性增长的来源。第三节回顾了中国经济的具体结构，以及总体绩效相对于真实汇率的敏感性。第四节描述了使用的模型和数据库的构建。第五节比较了内源性增长的几种情景。第六节总结。

对出口导向型增长的远离

经济发展的首要特点是将人口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就业。在城市部门物质资本的可及性确保了有更高的收入和能够更有效地获得基础服务。这要求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至少在初期有基本的（主要是初等的）教育和培训。这些条件的满足能够提供适于从事轻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如果中国的产权保护和出口基础设施服务是充分的，经过充分培训的工人的可获得性就能够吸引来自国内储蓄和国外直接投资的资本。在“东亚模式”

中，大部分来自农村的移民进入了制造业部门，尽管有一些进入了同样得到扩张的建筑和其他服务业部门。^① 在最后阶段，从中等水平向高等水平人均收入的转变需要进一步的教育和培训，以适应复杂服务业的增长。

出口导向型增长的优点

在“东亚模式”的早期阶段，轻工业产品地区性供给的增长会超出本地需求。轻工业的比较优势是通过贸易开放实现的，因此国内劳动力通过出口进行了转化。很明显，这一变革同样使得那些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贸易伙伴受益。这是因为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对他们而言是正向的：轻工业进口品很便宜，而他们所出口的技术密集型耐用（消费和资本）品会有更高的需求。并且，由于这些发展中经济体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对外开放为一体化的全球经济进一步提供了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力，FDI的机会就很丰富，而这些工业化国家的储蓄者可以因此获得更高的回报。特别地，“东亚模式”还提供了高储蓄的家庭和企业，他们为全球经济供给了超额储蓄。这些超额储蓄为工业化经济体以增进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投资和政府支出提供了融资。^②

向内看的选择

“东亚模式”的变种作为贫穷国家进行赶超的占主导地位的基础原则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Dooley et al., 2004）。那么为什么中国现在应当选择“向内看”？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不可避免地，中国将会停止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并以日本、中国、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之前的方式向复杂产业链的上游移动。这通常伴随着农村向城镇移民的放缓和真实工资率的加速上涨——刘易斯“转折点”（1955）。对于转折点的临近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经过最谨慎考虑的证据显示中国可能距离刘易斯转折点仍然很远（Cai, 2010; Golley and Meng, 2011）。尽管如此，与中国的“一胎”政策相关的人口转型确实加速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并且劳动力成本在近些年也确实急剧增长了。即使劳动力收紧的过程是平滑的，与此相关的向较

① 印度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主要去了服务业，而制造业受到管制和基础设施约束的限制。参见 Bardhan (2010)。

② 尽管事实上，在这些国家便宜的信贷并不总是引起增长增进型的支出，他们在公共和私人支出上的过失并非亚洲高储蓄的错。

缓慢增长的转型仍然可能是突然的和具有破坏性的，像日本在 1980 年代晚期所经历的那样^①，因此，中国政府寻求确保平滑的转型是有可能的。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出口流入地区的增长已经放缓。如果仍然以当前的速度出口，将增大贸易条件进一步快速恶化的前景，因此，中国可从出口导向型增长获得的好处就会更小。^② 第三点是由出口目的地国家对过去十年中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反对和对中国政策所感受到的不公平以及贸易伙伴国在制造业上的就业损失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当大量的中国工人进入现代部门这一过程被认为与西欧和美国十分之一的非自愿性失业相关时，对中国出口的政治攻击和一般意义上的反华仇视就更容易发生。这种关联性在政策辩论上有很高水平的支持，特别是在美国（Bernanke, 2006; Krugman, 2010）。

西方的激烈反应本质上是重商主义的，并且大部分都指向中国的汇率。在美国认为中国操纵汇率的看法源于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角色以及由于缺乏竞争而要求进行货币贬值时所面临的困境。在 1980 年代，这种怒气撒在了日本身上，导致了广场协议的签订以及日元的大规模破坏性升值（Goyal and Mckinnon, 2003; Hamada and Okada, 2009），并且最终导致了美国“1988 年汇率与国际经济协调法案”的出台，这一法案将美国对货币操纵的“防御”正规化了。贫困和与此关联的低工资水平在美国的政策辩论中被看做不公平的贸易优势而不是被看做由扩大贸易来解决的问题。人民币对美元的潜在真实汇率自 2004 年以来已经大幅升值并将继续升值这一事实似乎并没有引起美国方面文献的注意（Tyers and Zhang, 2011）。^③

最后，中国正因为政治权利缺失和其对待藏族和回族等对现状不满的少数民族的方式而遭受持续的批评。这些批评有时是正当的，但是通常源于对中国成为潜在战略对手的恐惧，以及对附加的政治和宗教权力的维护会在这样一种竞争中削弱中国的想法。尽管对中国政府及其政策的外部批评有时候是出于良好的意图，但大多却是出于排外目的并且是在忽略和漠视中国增长

① 关于日本 1980 年代晚期开始停滞的文献很多。参见 Hayashi 和 Prescott（2002）、Tyers（2011）。

② 这呈现出“贫困化”增长的前景，这一点作为中国出口扩张的一个结果已经被热烈地讨论过，至少对于那些同中国竞争的、比中国小的、更贫穷的出口者而言是这样的（Bhagwati, 1987）。

③ 尽管美国方面的文献继续受到抑制，由盖特纳所领导的美国财政部——“货币操纵”标签的守护人——已经不断努力强调真实汇率所发生的调整是他们不愿意引例中国的背后论点之一。感谢 Huw McKay 注意到这一点。

对西方所带来的巨大收益的情况下频繁地做出的。然而，在中国内部，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而通过投资来“转向内部”的做法已经作为一种将增长的成果转移给发展滞后的地区和农业部门的获得了正当性的方式。

增长的内部来源

对增长的潜在内部贡献有很多，包括在创新领域和人力资本增长方面改善了的政策执行（Robertson, 2011）以及迁移工人的城市化（Song et al., 2010）。接下来的部分所关注的焦点是增长的一些特定来源，它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自然继承者，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

给定在 2008 ~ 2009 年全球衰退期间中国激增的公共投资的显而易见的成就，政府自然被引导将扩张的政府活动看做未来增长的一个内在来源。并且发展中国家对作为增长基础的公共品供给的不足十分常见。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这些公共品包括支持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设施和监管机构、交通运输和通信设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环境保护。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是幸运的，它于 1994 年实施了一项明智的税法，使其得以获得不断增加的经济活动份额。这意味着中央政府的税收以快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速度增加，而正是这一点允许在不增加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实现公共投资的大幅增长（Jia and Liu, 2009）。^① 因此，依赖于挤出的程度和储蓄者中的李嘉图等价是否成立，政府活动的上升可能通过减少家庭收入在国外资产和产品上的支出来帮助扩大中国的 GDP。家庭收入投向国外资产和产品会支持国外总需求而非国内需求。然而，除了相对短期的一次性的总产出变化之外，还不清楚扩张的政府活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

一个重要的、未被利用的增长来源是将产业改革扩大到重工业和服务业。这些部门的国有企业受到了相对保护，阻止了大的外资所有权。其结果之一是这些企业——为依靠更具竞争性的轻工业出口部门的发展而快速扩张的经济体提供基本原材料和服务——利润丰厚（Lu et al., 2008）。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以上缴红利的方式给予中央政府微不足道的回报，使它们的利

① 北京财政赤字温和增加的一个更少公开的原因是不断增加的省级公共项目支出的大量资金来自商业银行，因此与储蓄率上升，至少是隐性的政府担保联系到了一起。这就是联邦政府目前为止所担心的表外项目。感谢 Huw McKay 对此所做的观察。其核心含义是私人储蓄在省级水平上为公共投资提供了资金。

润并没有再分配给它们的公共所有者。相反，它们的利润被用于再投资了。结果，储蓄或消费这一部分国民收入决策被从家庭手中剥夺了，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的超额储蓄——超过中国 GDP 的一半。^①

巨大的潜在增长存在于对这些垄断租的再分配。对这些垄断租的再分配将会使中间品更为廉价并能够培育总产出增长，同时提高私人消费。许多可能的手段可以实现对垄断租的再分配，其中的一些已经被尝试过。

(1) 纯私有化。将国有企业利润返还给私人家庭并培育消费，提升对中国产品和服务的国内需求。

(2) 国有企业分割。将会施加更多的企业间竞争从而减少成本加成。

(3) 对国有企业定价更严厉的规制。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迫使企业以平均成本定价，消除垄断租和降低价格水平。

以下各节的分析对这些选择进行了考察。

中国的结构、绩效和真实汇率

转向内部的影响相当重要地依赖于中国潜在实际汇率的后续变化，或者其全球竞争力水平。这一特别的敏感性源于表 2-1 所描述的经济结构。这一经济结构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1) 大部分非农就业存在于出口导向的轻工业部门——实际上，这部分的就业超过了农业就业。

(2) 轻工业部门主导了中国的出口。

(3) 轻工业是相对竞争的——价格加成很低，因此纯利润或经济利润只占到了总收入很小的一部分。

(4) 国有企业占主导的能源、金属和服务部门劳动密集度较低，同时它们是寡头垄断的，产生了大量的垄断租。

由于出口企业是高度竞争性的，产生了极少的纯利润并承担了大部分的或“现代部门”就业，未来的就业表现对国内工资和出口价格的相对比值非常敏感，从而还对中国的真实汇率非常敏感。

^① Kuijs (2006)、Kuijs 和 He (2007)、Tyers 和 Lu (2008) 考察了过去十年中企业储蓄对中国总储蓄率和经常账户盈余的贡献。

表 2-1 中国的结构，ca 2005^{*}

百分比	新增增加值比重 占 GDP 比重 (%)	总生产就业比重 (%)	总出口比重 (%)	纯利润占总收 入比重 (%)
农业	13	24	2	0
石油、煤炭、金属	16	11	10	20
轻制造业	29	33	82	5
服务业	42	32	6	20
总计	100	100	100	12

* 纯利润计算自对会计利润的国民统计估计，减去了服务业优惠利率所要求的回报。此处显示的是总税收和公司储蓄以及它们占总收入的份额。

资料来源：Model 数据库，来自 Dimaranan 和 McDougall (2002)，国家数据更新至 2005 年。

然而能够对扩大中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的内向型政策变化都会影响真实汇率。首先考虑政府扩张的情况。政府支出增加导致真实汇率升值的渠道有很多。

蒙代尔 - 弗莱明效应

当金融资本全球流动时，即使是不完全的流动，增加的政府借款仍然会提高国内产出和引起金融资本流入 (Fleming, 1962; Mundell, 1963)。净效应是提高国内产品相对于 (供给更富弹性的) 国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使真实汇率升值。

不可贸易品需求效应

一旦政府将其支出集中于非可贸易服务，政府扩张就改变了总需求构成使其流向更缺乏供给弹性的国内产品并抬高了这些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导致真实汇率上升。^①

寡头垄断租效应

增加的政府支出提高了对国内产品的国内需求，减少了平均企业产出中的出口份额。因为国外需求更富有弹性，减少了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需求弹性，同时又提高了它们的加成水平。并且，由于这些企业主要存在于受到保护的重工业和大量的不可贸易的服务业部门，价格的上涨将会通过提高非可贸易服务的价格和增加竞争性出口部门面临的成本使真实汇率升值 (Tyers

^① De Gregorio 等 (1994)，Froot and Rogoff (1995) 以及最近 Galstyan 和 Lane (2009) 认识到扩大政府支出会通过这一渠道引起真实汇率升值，即使是公共支出，至少在短期内也会引起真实汇率升值。

and Lu, 2008)。思考这一点的一个方式是超额利润是通过减少产出供给获得的，因此寡头垄断企业降低了大量非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

在评估财政扩张方面，通常会发现，财政扩张对真实汇率的负向效应更多地被产生的总需求扩张所抵消了。一个关键机制是政府支出的增加至少是暂时地减少了国民储蓄率，这要求李嘉图等价失效。由于减少了国民储蓄，压缩了表现为外汇储备积累的国外支出渗漏，经常账户盈余得以减少且更多的支出进入了国内部门而非国外经济体。这会产生导致国内通货膨胀或者抑制通货紧缩的效果。如果是后者，就将稳定名义工资和价格水平的关系，从而维持一个稳态就业水平。Tyers 和 Huang（2009）对中国政府支出采用了这一短期做法。在本研究中，关注的焦点是长期发挥作用的变革性增长来源，因此此处所考虑的政府扩张在定位上是长期的，并且因此是依赖于税收筹资的。

回到寡头垄断定价对真实汇率的影响，我们还考虑了实施进一步产业改革这一选项。在减少寡头垄断加成的程度上，产业改革将会使真实汇率贬值，从而保持中国出口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力。

在中国服务业部门 FDI 的更多的选择提供了增长的服务业生产率。这同样会通过减少非可贸易品相对价格使真实汇率贬值。为了量化其对中国总体经济绩效的影响，本章提供了一个有关中国经济的完整模型。

一个中国经济的寡头垄断模型

为了捕捉寡头垄断 SOEs 的行为，我们采用了关于中国经济的比较静态宏观经济模型。模型嵌入了多层产业结构，其中所有的行业都被作为寡头垄断行业对待，每一个行业中的企业都供给差异化产品并相互影响产品价格。^① 该模型在 Tyers（2012）一文中以及 Tyers 和 Lu（2008）的附录中进行了详细讨论。此处对相关的要素进行简要概括。

行为基础

模型具有新古典基础，包括最终消费品、中间需求以及由资本部门创造的需求，这与大多数总体经济模型的做法相同，同时假定嵌套的

^① 该模型是 Harris、Cunasekera 和 Tyers（1990）模型的远亲，尽管被显著的一般化了，以包括进宏观经济行为。

CES 偏好。^① 政府支出为外生政策变量，但是通过一个嵌套的常弹性替代（CES）系统在各商品和服务间进行再分配，而政府收入则来自同时包括直接（收入）税和间接税的税收体系。直接（收入）税分别对劳动和资本收入征收，间接税则对自产品消费和进出口征收。^② 对资本品部门需求的总投资水平表现为 Q 型，受到国内建成资本的正向影响以及融资利率的负向影响。融资利率从一个开放的“债券市场”获得，在该市场中，对国内和国外债券进行了差异化处理以表现中国的资本控制。储蓄来自储蓄率相同的集体家庭以及储蓄率随着行业变化的企业。同时假定 SOEs 的企业储蓄（留存利润）取决于纯（经济）利润的规模。国外直接投资和官方外汇储备积累均用于完整化中国的外部金融账户。^③

模型与通常做法的区别之处在于对生产的设定明确地考虑了寡头垄断。每一个行业中的企业都供给差异化的产品。这些企业拥有随产品变化的固定成本且作用于价格。可变成本取决于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技术，使得平均可变成本在要素和中间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为常数，但是平均总成本随总产出下降。^④ 企业在平均可变成本之上策略性地选择一个成本加成，将价格提高到平均可变成本以上且不会被现存竞争者拉低价格的能力决定了任何的纯利润水平，并且从长期上决定了新企业进入的可能。

因此，假定行业中的每一个企业 i 生产一个唯一的产品种类，面临一个弹性为 ε_i (< 0) 的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最优加成由方程 2 - 1 给出

$$m_i = \frac{p_i}{v_i} = \frac{1}{1 + \frac{1}{\varepsilon_i}} \quad \forall i \quad (\text{方程 2 - 1})$$

在方程 2 - 1 中， p_i 是产品价格， v_i 是平均可变成本， ε_i 是企业面临的需求弹性。企业在考虑其他企业定价行为的基础上选择其最优价格水平。接下来将行业 i 的一个推测变量参数定义为任何企业 k 对企业 j 价格的影响。对于这一参数，非合作（纳什）寡头对应一个零值，而对于完全卡特尔则取值为 1。尽管不能轻易地估计企业间价格合谋的水平，但是对中国的每一个行业我们都依据加成和需求弹性的先验知识对企业间价格合谋水平进行了校准。

① 例如，参见 Dixon 等（1982）。

② 收入税与统一税率近似，税率为各种情况下收入和税基的商。

③ 下文中，中国收支平衡表中的资本、金融和官方次级账户一律称作“资本账户”。

④ 尽管企业在产品市场上是寡头垄断的，在购买初级要素和中间品投入上没有垄断力量。

模型行为的关键在于某一个行业的产出都有五个不同的需求来源。从而行业 i 中企业所面临的需求弹性 ε_i 取决于这五个市场中的需求弹性和某一个市场所占的国内产品份额。这五项需求分别是最终需求 (F)、投资需求 (V)、中间品需求 (I)、出口需求 (X) 和政府需求 (G)。对于行业 i ，适用于上述的弹性^①是全部五项需求的组合 (见方程 2-2)。^②

$$\varepsilon_i = S_i^F \varepsilon_i^F + S_i^V \varepsilon_i^V + S_i^I \varepsilon_i^I + S_i^X \varepsilon_i^X + S_i^G \varepsilon_i^G \quad \forall i \quad (\text{方程 } 2-2)$$

在方程 2-2 中, S_i^j 表示对于每一个需求来源 j 在市场 i 中的国内产品份额。这些份额参数在模型中是完全内生的。

因此, 企业的策略性行为以及寡头垄断的经济成本一方面受到企业合谋行为的影响, 另一方面受到企业所面临的需求来源构成的影响, 两者都通过各类需求的平均弹性起作用。因此, 当经济冲击改变了需求构成时, 它们还改变了企业所面临的平均需求弹性。当平均需求弹性下降时, 寡头垄断企业会增大成本加成并攫取更多的垄断租。当然, 垄断租的取得依赖于成本, 尤其是固定成本。如果一个行业中有新的进入者, 固定成本就会随企业数目上涨, 增大平均总成本, 从而增大维持盈亏平衡所需的成本加成。

模型结构

表 2-2 详细地给出了模型的范围。表 2-3 和表 2-4 分别给出了各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初始需求份额、需求弹性和成本加成。模型化的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 意味着它没有能力影响进口品的边际价格, 但是其出口产品和

表 2-2 模型范围

地区	中国 世界其他地区
主要要素	土地 自然资源(矿产、能源储备) 熟练(专业)劳动力 非熟练(生产)劳动力 物质资本

① 见原著第 29 页页下注 19。

② 对这些弹性的表述是多而杂乱的。在 Tyers and Lu (2008) 一文的附录中有推导。

行业	农业 金属,包括钢铁,矿产和(非煤炭)采矿 煤矿开采和生产 石油生产和提炼 加工农业 电子设备 汽车 化学、橡胶和塑料制品 纺织业 其他制造业 电力供应和分配 煤气供应和分配 通信 保险和金融 交通 建筑 其他服务业
----	--

资料来源：对 Dimaranan 和 McDougall (2002) 第六版 GTAP 数据的 57 个行业加总得到。

表 2-3 分行业要素密集度 a

	资本	生产劳动力	熟练劳动力	土地和自然资源
农业	11	59	0	30
金属和金属矿产	66	27	5	2
煤炭	28	30	3	39
石油	86	5	1	8
加工农业	38	54	8	0
电子设备	66	26	8	0
汽车	59	35	6	0
化学产品	62	32	6	0
纺织业	40	53	7	0
其他制造业	68	27	5	0
电力	69	21	10	0
煤气制造和生产	49	37	14	0
通信	92	5	3	0
保险和金融	80	12	8	0
交通	78	18	4	0
建筑	56	37	7	0
其他服务业	54	27	19	0

a 表中为根据数据库计算的每一个行业总增加值中的要素份额。资本份额包括纯利润。水平加总值为 100%。资料来源：模型数据库（社会会计矩阵），源自 Dimaranan 和 McDougall (2002)。

表 2-4 初始需求份额、弹性和加成^a

	需求份额(%)						需求弹性						平均需求弹性	行业加成 ^b
	中间品	最终品	出口	投资	政府	中间品	最终品	出口	投资	政府				
	农业	53	40	4	3	0	-10.2	-28.6	-40.1	-15.6	-16.0	-18.8		
金属和金属矿产	84	3	10	2	1	-2.9	-4.4	-8.9	-2.8	-2.8	-3.5	1.39		
煤炭	61	4	33	0	2	-3.6	-6.1	-11.2	-2.4	-2.5	-6.2	1.19		
石油	58	12	5	14	12	-2.1	-2.8	-6.2	-2.3	-2.1	-2.4	1.69		
加工农业	50	34	15	0	1	-12.0	-30.8	-26.8	-16.4	-17.0	-20.7	1.05		
电子设备	24	4	65	6	0	-2.7	-6.4	-9.8	-2.9	-2.9	-7.5	1.15		
汽车	46	8	15	29	1	-4.8	-10.0	-16.9	-3.4	-3.7	-6.6	1.18		
化学产品	77	6	17	0	0	-3.6	-6.3	-10.4	-2.5	-2.5	-4.9	1.26		
纺织业	45	11	44	0	0	-6.5	-16.9	-25.7	-10.4	-10.2	-16.1	1.07		
其他制造业	43	5	35	16	0	-2.6	-7.1	-9.5	-4.0	-4.0	-5.5	1.22		
电力	84	13	1	1	1	-6.4	-12.3	-21.0	-7.5	-7.7	-7.3	1.16		
煤气制造和生产	50	10	0	8	32	-4.9	-7.7	-13.4	-4.8	-4.9	-5.2	1.24		
通信	42	24	1	5	27	-1.7	-1.4	-5.1	-1.5	-1.7	-1.7	2.45		
金融	57	29	2	3	8	-1.8	-2.6	-6.6	-2.2	-2.2	-2.2	1.86		
交通	53	18	8	7	14	-1.3	-1.6	-5.9	-1.6	-1.5	-1.8	2.26		
建筑	4	2	0	86	8	-2.5	-5.1	-12.3	-4.4	-4.0	-4.3	1.30		
其他服务业	46	21	4	4	25	-3.4	-8.6	-11.7	-3.1	-2.8	-4.7	1.27		

^a 所有变量在模型中均为内生变量。此处为初始(基期)值。

^b 行业加成是生产者价格同平均可变成本的比值。

资料来源：模型数据库(社会会计矩阵)，源自 Dimaranan 和 McDougall (2002) 以及 2005 年国民经济统计数据。

与其相竞争的国外产品有差异，从而面临有限的需求弹性。消费者价格指数是从家庭总支出函数推导到的（消费税）税后国内消费品和（关税）税后进口品价格指数的一个柯布 - 道格拉斯组合。CPI 的计算公式有助于分析福利影响。由于集体效用同样被定义为一般产品消费量的柯布 - 道格拉斯组合，总经济福利的比例性变动与真实国民总产出（GNP）同步。

国内拥有的物质资本数量在短期内和长期内都是固定的，因此总资本存量的变动会影响外资所有权份额并继而影响流向国外的所得。在接下来展示的试验中，自始至终都假定一个长期闭包。^① 国内和国外资本债权是差异化的，物质资本是同质的并且可以在行业间完全自由流动，因此在国内和国外债券收益（利息率）之间存在一个源于金融资产差异（即源于对内和对外的资本控制的保留）和内生性储备管理政策的楔子。所有的真实单位要素回报都是可变的，而国内要素供给是固定的。一个固定的寡头垄断结构被保留下来，假定 SOEs 得到保护以免受竞争性进入的影响，并且如果发生损失将防止其退出。与中国迄今为止的财政保守主义相一致，基础财政赤字保持不变，外生性支出变化由税率的内生性变动来处理。

对比替代性的体制

为量化自然减速的情形，模拟以持续性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开始。然后考虑政府扩张——首先通过提高消费税融资，接着通过提高企业税融资。在产业改革上，考虑四种类型。首先，通过允许所有的 SOEs 利润以私人家庭集体性收入的形式进行积累来模拟纯私有化。其次，尝试了 SOEs 的三重分割，以引起更富竞争性的定价。再次，施加价格帽管制以迫使成本加成回到恰好可以充分覆盖平均成本的水平。最后，考虑将服务业部门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这一选项，从而在服务业部门培育加速的生产率增长。如此一来，这些模拟考虑了能够为中国的 GDP 提供主要增长动力的政策变化。这些推动力可以取代由出口导向型增长所产生的推动力。

进一步的出口导向型增长

这一模拟通过对生产率的一些代表性冲击和允许劳动供给上升的闭包阐

^① 这同 Tyers 和 Huang（2009）所给出的本质上为短期的结果相反。

释了持续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加表明其继续释放出工人的能力，同时，轻工业出口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也有一个上升，以代表持续流入该部门的 FDI 的影响。还有一个比较任意性的真实生产工资的增加，这在该模拟中被设定为外生，从而使得现代部门的劳动供给可以增长。正如预期的那样，工人继续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国外资本流入和扩张十分显著。结果在表 2-5 第一列给出。^①

表 2-5 模拟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和政府扩张效应^a

百分比变化	持续的出口导向型增长 ^b	超出刘易斯拐点的出口导向型增长 ^c	政府通过征收 25% 消费税进行扩张政策 ^d	政府通过征收 30% 公司税进行扩张政策 ^e
真实 GDP	16.6	4.9	2.6	-1.7
真实 GNP	9.3	3.9	-8.9	0.6
真实汇率	1.3	3.5	1.3	2.0
出口/GDP	19.1	5.8	-7.9	-10.0
消费/GDP	-8.7	-2.9	-2.1	0.8
经常账户盈余/GDP	17.0	-3.2	-4.4	-2.4
生产雇佣	17.7	0.0	0.0	0.0
真实生产工人工资	2.0 ^e	7.2	-3.5	-3.3
真实熟练工人工资	18.4	4.1	-1.5	-0.7
物质资本存量	19.8	5.3	-1.4	-1.5
真实国内资本收入 ^f	-3.8	-3.2	-13.6	-7.1

a 所有模拟都是在长期模式下进行的——内生性资本存量和超额储蓄的外生性外部回报率以及农业和其他部门间工人的完全流动性。然而，寡头垄断企业的数目是给定的，所以纯利润是内生的。

b 该模拟保留了当前的政策体制，采用了 4% 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以持续地释放出工人，和由持续的 FDI 引起的 4% 的轻工业部门生产率增长，以及真实生产工资 2% 的外生性增长。因此，现代部门的劳动供给得以大幅度增长。

c 此处没有要求农业生产率增长，生产工人的供给是给定的。

d 这些模拟代表了税收融资的财政扩张，在通过消费税融资的情况下，这将政府支出占 GDP 的份额提高了四分之一；在通过资本收入税融资的情况下，将政府支出占 GDP 的份额提高了三分之一。

e 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真实生产工资的增长是任意给定的 2% 的外生性增长。

f 真实国内资本收入指国内自由资本在减去税收和折旧后所取得的收入。

资料来源：所描述模型的模拟结果。

刘易斯转折点

此处，我们采用相同的冲击，改变闭包设定以使劳动供给固定而真实工

① 国内资本所有者的真实净收入事实上有微弱下降。这是由于在这种情况下总储蓄持续增加，同时又保留了资本控制。额外的储蓄不完全地转向了外汇储备，而国内债券收益下降。

资内生，区别在于农业部门没有与工人不断离开相关联的生产率增进，结果在表 2-5 第二列给出。在这种情况下，不再有剩余工人，因此增长只来自生产率变化并且大大降低了。然而，真实生产工资上涨得更快，而经常账户盈余由于受保护部门纯利润的下降（效果上，工人以资本损失为代价获得利益）以及继而下降了的公司储蓄而减少。经常账户因为储蓄变动而恢复平衡，并且 SOEs 的垄断租以有利于工作家庭的方式进行了“自然的”再分配。如果在冲击中政府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的政策，同时增长明显放慢，中国经济的许多其他的结构问题也都将被纠正。

消费税支撑的政府扩张

长期上政府活动的扩张必须得到来自税收的资金支持。此处可选择的工具是消费税。此处所进行的政策试验是令 GDP 中的政府份额随意性地上涨 25%。这要求消费税收入增长税基的 14%，是一个巨大的负面冲击，导致真实国内要素收入在新的国内价格水平上收缩。表 2-5 第三列所显示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国内工人和国内资本都受到了损失，从而真实 GNP 缩水；然而，真实 GDP 有微弱的增加。这是由于保留了大量的国外资本，而这部分收入不被征收消费税，而且以国外价格计价的资本真实回报率在真实劳动力成本下降的基础上增加了。受保护的重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扩张，而私人家庭和工人的情况变差了。

企业税支撑的政府扩张

如果政府支出由企业税或者资本收入提供资金支持，税收的净效果就会像表 2-5 最后一列给出的那样。将 GDP 中政府份额提高 30% 需要资本收入税税基增加 7.7%。由于公司储蓄依赖于利润，利润的下降同时导致了经常账户盈余的减少。除了国内资本所有者真实收入的显著下降外，这一政策对总体经济活动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扩大政府规模，至少通过税收扩大政府规模，在当前模型假设下很少能提供真实的长期扩张。^① 一个关键点是政府

① 另外一个衡量由债券融资支持的类似扩张的效果的实验发现真实 GDP 和 GNP 都萎缩了。这一结果由 Tyers 和 Huang (2009) 在短期模型中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通常的凯恩斯模型扩张更多的是被垄断价格增长和相关的真实汇率升值抵消了。

扩张情形下需求的内部转向，这减少了出口产品份额，因此减小了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需求弹性。结果是更温和的但是有影响力的真实汇率升值，这种升值在任何情况下都大于没有寡头垄断行为的情况。

纯私有化

第一个冲击是将 SOEs 资产的大部分转到私人手中，使利润重新分配到家庭部门。各行业企业储蓄率一直减少到总企业储蓄相当于 GDP 5% 的更正常的水平，^① 从而大部分的税后企业收入都进入了家庭部门，可以被他们用于储蓄或者消费。^② 但是如此一来就将减少国民储蓄和经常账户盈余，如表 2-6 所示。然而，除此之外，模拟表明只要 SOEs 所面临的竞争仍然受到限制，私有化及其本身就无法实现可观的增长。^③

表 2-6 模拟的产业改革和扩张潜力 a

百分比变化	纯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b	纯粹国有企业分割:三个部分 ^c	国有寡头垄断企业价格帽制度 ^d	服务业驱动的增长:4%生产率
真实 GDP	0.6	-12.9	28.3	15.9
真实汇率	0.8	-13.8	13.0	6.5
出口/GDP	1.2	2.9	-8.2	-6.6
消费/GDP	-10.6	-17.2	42.9	22.3
经常账户盈余/GDP	13.2	17.6	-12.0	-7.0
生产雇佣	-61.9	-143.3	80.4	48.7
真实生产工人工资	-0.2	15.6	30.4	19.4
真实熟练工人工资	0.9	-1.6	42.1	21.8
物质资本存量	-0.4	26.4	28.3	16.9
真实国内资本收入 ^f	-0.7	-50.0	4.4	3.2

a 所有模拟都是在长期模式下进行的——内生性资本存量和超额储蓄的外生性外部回报率以及农业和其他部门间工人的完全流动性。然而，寡头垄断企业的数目是给定的，所以纯利润是内生的。

b 纯私有化要求所有的税后企业收入都进入集体私人家庭并被私人家庭分配到消费和储蓄上。

c 重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企业数量扩大了三倍。

d 价格帽改变了寡头垄断企业的定价共识，迫使他们将平均成本以上的加成减半。

f 真实国内资本收入指国内自由资本在减去税收和折旧后所取得的收入。

资料来源：所描述模型的模拟结果。

① 这是中国台湾企业储蓄的规模。参见 Tyers 和 Lu (2008)。

② 这是通过降低企业储蓄率（利润留存率）以使可支配的企业收入积累到家庭部门来实现的。

③ 如果假定私有化可以消除 X-无效率，并从而通过使绩效差的企业成为收购目标来提高生产率，那么这种变化就可能产生一次性的增长。

SOEs 的分割

此处 SOEs 在部门内部进行分割以鼓励价格竞争，这是在一些受保护部门中的流行做法，然而模拟表明其结果并不怎么吸引人。我们令重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寡头垄断企业数量增加三倍，其效果在表 2-6 第二列给出。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尽管可以引起更具竞争性的定价从而减小加成，但是每一个新企业都有固定成本，从而使部门固定成本充分增加并使价格上涨，尽管加成确实下降了。因为要求有固定资本，资本存量显著增加了，但是资本回报却减少了。尽管生产工人获益了，但国内资本所有者却遭受了损失，并且没有产生显著的增长。

对 SOEs 更严厉的价格帽管制

对 SOEs 实行更严厉的价格帽管制的结果是更为积极的。确实，结果表明这一政策选项可以获得显著的、新的增长。在存在固定成本的寡头垄断行业，需要超出平均可变成本的加成以实现盈亏平衡。在模拟中，设定价格帽以迫使企业减少加成到能够弥补平均成本的水平。这类价格帽管制看起来在许多工业化国家都取得了成功，模拟结果也表明在中国能够取得减少产品被用作中间投入的行业的生产成本效果，从而使经济活动显著扩张。如表 2-6 第三列所示，更低的成本使真实汇率贬值，为出口部门提供了帮助，并且，除总体经济扩张以外，它还通过再分配垄断租和提升工资消除了近几十年来大部分的收入不平等。

由 FDI 引起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

最后一项模拟考虑了能够通过进一步外商投资带来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效应。结果在表 2-6 最后一列给出。更有效率的服务业部门导致了真实汇率贬值，促进而非损害了出口，并且培育了整体增长。尽管存在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仍然会发生中国经济同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结构性收敛。模拟产生了显著更高的真实工资，使技术型和生产型工人都有所受益。然而，这也代表着更高的成本，从而引起了有利于重工业的工业产出和出口的再分配。中国经济在持续开放，但是它比以往更依赖同西方国家进行的产业内贸易，以美国和西欧的那种方式。

内生性增长的政治困难

尽管此处得到的结果依赖于模型中一些潜在的强假设^①，但它们清晰地表明为了从内部寻求更进一步的增长，中国需要将产业改革的其他要素同对寡头垄断租的更激烈的管制性攻击相结合。在政治上，这将会是困难的，相同的还有实现进一步增长的另外一个关键要素——主要的国有服务业部门的大幅度生产率增长。实现这一点要求服务业具有与制造业相同水平的 FDI。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反对在关键服务业和重工业行业存在外国所有权，因此允许这样的 FDI 在政治上也将是非常困难的。

总 结

伴随着出口导向型增长的行将结束和由不断增大的国内不平等与近来的高经常账户盈余的冲突，中国需要的是更进一步的变革性增长，这一变革性增长将会维持它的赶超步伐并解决其内部和外部的冲突。一个不可避免的、即将发生的变革来自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将会加速真实工资率增长，因此将进一步增长的成果分散化并导致企业储蓄份额下降，因为真实工资率的增长会提高总收入中家庭所占有的份额。这进而会减少总储蓄和经常账户盈余。当然，这同时会要求进行成本高昂的调整，因为正如前一节所分析的，增长将会放缓，对一直以来高效的和富有竞争性的轻工业部门的新增劳动供给将逐渐减少。并且，中国的增长带给全球经济的净收益也会下降。然而，如果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Garnaut, 2010），这一转型是迫切的，它能够带来的不幸中的希望是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压力减弱了，对放弃迄今为止成功的市场导向的政策体制的激励减少了。

但是仍然存在维持整体增长率和实现有序转型的问题。对于后者，韩国

① 其中一个这样的假定是私人家庭对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保持不变。尽管并不清晰，那些引起大幅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政策变化，例如私有化，可能导致储蓄率的变化。一个永久收入增加的情况可能意味着有一个储蓄率的上升，但是此处关注的是长期稳态，在这种情况下，预期到持续更高收入的家庭可能会选择一个更低的储蓄率。沿着 McKibbin 和 Woo (2004) 的路线，一个完全动态的方法会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尽管即使这样，结果仍然依赖于有关家庭预期形成的存在许多争议的假设，并且预测的整体绩效变动的方向和相对规模不大可能被改变。

和中国台湾都进行了有序的经济转型，远离了通过劳动密集型出口进行的劳动力转型。二者都发生了倾向自由民主的政治转型，这以城市中产阶级成为多数为开端。当然，它们得到了与中国本身的迅速增长相关的激励。日本最初的转型是有序的，从1970年的石油和商品危机中复苏过来，但是随后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的政策错误打破了这种秩序。日本的相对自由民主没有能够发现和解决这些问题，尽管身边伴随着中国的增长。现在，中国必须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是在缺乏与周边增长相联系的外部刺激的情况下。

至于缓和增长的减速，需要新的变革性增长来源以避免快速的甚至可能是破坏性的减速。本章通过对一个明确考虑了SOEs寡头垄断行为的具有17个部门的中国经济模型的模拟和一个捕捉到了基本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大竞争性的轻工业出口部门和寡头垄断的重工业部门以及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服务业部门——的数据库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处理。结果表明进一步的变革性增长来源确实存在，但是要开发利用这些来源，中国政府必须对其进行深挖和进行产业改革。这些产业改革要减少当前集中了经济收益的垄断租，与此同时欢迎FDI进入迄今仍受到保护的服务业。从这些产业改革中能够获得的好处是巨大的，不仅包括最终使真实人均收入向西方国家收敛，还包括减少的不平等和更强大的、更多外部参与的重工业和服务业。

尽管中国政府自1980年代早期以来经常面临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挑战，而且迄今为止一直表现得很有效，但在中国进行这些改革在政治上也将是难以完成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增长的基本面看起来都不错，继续转型的障碍也为政府及其各部门所知晓（*The Economist*，2011）。对更多消费的持续的外部呼吁本质上是排外的——相当于要求中国减少投资和令其经济表现得更差。一个强大的中国经济和一个平滑的经济转型是符合全球利益的，前提是来自西方的政治压力要得到克制。与此同时，就学习日本经验和抵抗要求采取对国内有害的经济政策变化的外部压力下，中国处在更有优势的地位。

参考文献

Balistreri, E. J., Hillberry, R. H. and Rutherford, T. J., Structural Estimation and

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odels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enth Annual Conference on Global Economic Analysis, Purdue University, Lafayette, Ind., July 2007).

Bardhan, P., *Awakening Giants, Feet of Clay: Assessing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2010).

Bergsten, C. F., Freeman, C., Lardy, N. R. and Mitchell, D. J., “China’s Ri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2008.

Bernanke, B., Speech to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5 December, 2006),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6/20061215>.

Bhagwati, J. N., “Immiserizing Growth”, in J. Eatwell, M. Milgate and P. Newman,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ed. (London: Macmillan, 1987).

Cai, 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Journal* 3 (2), 2010.

Deer, L. and Song, L., “China’s Approach to Rebalancing: A Conceptual and Policy Framework”, *China & World Economy* 20 (1), 2012.

De Gregorio, J., Giovannini, A. and Wolf, H.,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radables and Non-tradables Infl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8), 1994.

Dimaranan, B. V. and McDougall, R. A., “Global Trade, Assistance and Production: The GTAP 5 Data Base”, Center for Global Trade Analysis, Purdue University, Lafayette, Ind. 2002.

Dixon, P. B., Parmenter, B. R., Sutton, J. and Vincent, D. P., *ORANI, A Multi-sectoral Model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North Holland: Amsterdam, 1982).

Dooley, M. P., Folkerts-Landau, D. and Garber, P., “Direct Investment, Rising Real Wages and the Absorption of Excess Labor in the Periphery”, NBER Working Paper (1062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4.

Easterly, W.,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 – 1998”, The World Bank, February 2001.

Eichengreen, B., Park, D. and Shin, K., “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1691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1.

Fleming, J. M., “Domestic Financial Policies under Fixed and unde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IMF Staff Papers (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62.

Froot, K. A. and Rogoff, K., “Perspectives on PPP and Long Run Real Exchange Rates”, in G. M. Grossman and K. Rogoff,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 ed, (Elsevier, Amsterdam, 1995).

Galstyan, V. and Lane, P. R.,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41 (6), 2009.

Garnaut, R.,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Turning Point”, *China Economic Journal* 3 (2), 2010.

Golley, J. and Meng, X. , “Has China Run Out of Surplus Labour?” , *Chinese Economic Review* 22 (4) , 2011.

Goyal, R. and McKinnon, R. I. , “Japan’s Negative Risk Premium in Interest Rates: the Liquidity Trap and the Fall in Bank Lending” , *The World Economy* (26) , 2003.

Gunasekera, H. D. B. and Tyers, R. ,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Returns to Scale in a Newly Industrialising Economy: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Korean Trade Policy”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34) , 1990.

Haber, S. H. , North, D. C. and Weingast, B. R. , “Introduction” , S. H. Haber, D. C. North and B. R. Weingas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e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Hamada, K. and Okada, Y. , “Monetary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Behind Japan’s Lost Decade” ,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3) , 2009.

Harris, R. G. , “Applied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Small Open Economies with Scale Economies and Imperfect Competition”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 1984.

Harris, R. G, Robertson, P. E. and Xu, J. , “The International Effects of China’s Trade and Education Booms” , *The World Economy* 34 (10) , 2011.

Hayashi, F. and Prescott, E. C. , “The 1990s in Japan: a Lost Decade “ ,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5) , 2002.

Jia, K. and Liu, W. , “China’s Fiscal Policies During the Post-Crisis Era” , Research Institute for Fiscal Science, Ministry of Finance, Beijing, 2009.

Krugman, P. , “Taking on China” ,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30, 2010.

Kuijs, L. , “How Will China’s Saving - investment Balance Evolve?” ,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58) , The World Bank, 2006.

Kuijs, L. , “How Much Will Asia Slow Down in a Global Downturn?” , Asia Pacific Economics Note, MF Global Hong Kong, October 7, 2011.

Kuijs, L. and He, J. , “Rebalancing China’s Economy—Modelling a Policy Package” , China Working Paper (7) , The World Bank, September, 2007.

Lardy, N. R. , “Toward a Consumption-driven Growth Path” , Policy Brief (6) ,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6.

Lardy, N. R. , “Sustaining China’s Growth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Lewis, W. A. ,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55).

Lu, F. , Song, G. , Tang, J. , Zhao, H. and Liu, L. , “Profitability of Chinese Firms, 1978 - 2006” ,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 (1) , 2008.

Lucas, R. E. , jr, “Trade and the Diffusio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 (1) , 2009.

Mundell, R. A. ,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s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9) , 1963.

McKibbin, W. and Woo, W. T. , “The Global Economic Impact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 Trade Policy Working Paper (3)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4.

Melitz, M. J. ,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 (6), 2003.

Olson, M. ,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Riedel, J. , “Seeing But Not Believ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China”,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2006.

Riedel, J. , “China Needs Many Things But not a New Growth Engine”, *Financial Times* (Asia edition), February 21, 2007.

Riedel, J. , “The Slowing Down of Long Term Growth in Asia: Natural Causes, the Middle Income Trap and Politic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2011.

Riedel, J. , Jin, J. and Gao, J. , *How China Grows: Investment, Finance and Refor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Robertson, P. E. , “Clash of the Titans: Comparing India and China”, J. Golley and L. Song, *Rising China: Glob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ed. (Canberra: ANU E Press, 2011).

Song, L. , Wu, J. and Zhang, Y. , “Urba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3), 2010.

The Economist, “How Real Is China’s Growth?”, *The Economist*, June 1, 2011, http://economist.com/blogs/freeexchange/2011/05/chinas_economy.

Tulloch, G. ,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5 (3), 1967.

Tyers, R. , “Global Implications of Japan’s Economic Stagnation”, CAMA Working Paper (20),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2011.

Tyers, R. , “Looking Inward for Transformative Growth in China”, CAMA Working Paper,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2.

Tyers, R. , “The Rise and Robustness of Economic Freedoms in China”, G. Moore,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in East Asia*, ed.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Press, .) 缺出版年份

Tyers, R. and Huang, L. , “Combating China’s Export Contraction: Fiscal Expansion or Accelerated Industrial Reform?”, CAMA Working Paper (2),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9.

Tyers, R. and Lu, F. , “Competition Policy, Corporate Saving and China’s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496),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8.

Tyers, R. and Zhang, Y. , “Appreciating the Renminbi”, *The World Economy* 34 (2), 2011.

Tyers, R. , Golley, J. , Bu, Y. and Bain, I. ,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Real Exchange Rate”,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 (2), 2008.

Walter, C. E. and Howie, F. J. T. , *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 (Singapore : John Wiley & Sons, .2011).

Wen, J. , “The Conditions for China to be Able to Continue to Guarantee Stable an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Beijing, 16 March, 2007), viewed 28 October 2011, [http: //www. npc. gov. cn](http://www.npc.gov.cn).

Wen, J. , “Report on Work of the Government”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Beijing, 5 March, 2011), viewed 24 March 2011, [http: //www. npc. gov. cn](http://www.npc.gov.cn).

World Bank, “Escap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 (2), The World Bank, 2010.

Yi, G. , “How China Plans to Strike an Economic Balance”, *CaiXin Online* [English], February4, 2011.

(张川川 译)